

評葛兆光，《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

北京：中華書局，2014，302 頁

孔令俐*

隨著全球化的興起，東亞的經濟、文化迅速發展，學界開始以「東亞」視角作為歷史研究的新方法，或關注其內在的文化互動與權力結構，或將之作為一個區域放在世界版圖中觀看。其中，「自我」和「他者」的互動、張力和融合，是東亞研究的重要面向。《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一書所關注的重點正是十七世紀中葉之後的東亞，處理朝鮮燕行使在前往清帝國朝貢的「過程」中，如何通過「異域之眼」來觀看中國？其中又涵蓋了觀察者自身怎樣的文化認同？以及在此過程中，「異域」視角下的清帝國乃至整個東亞世界又經歷著怎樣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變遷。

作者葛兆光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教授，從 2000 年起，他開始關注並研究日本、韓國以及越南有關中國的漢文文獻，進而圍繞「從周邊看中國」、「交錯的文化史」等論題展開了一系列研究。特別是在 2011 年出版的《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一書中，以中國學者的主體性自覺來探討要如何從歷史、文化和政治的三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個向度來理解「中國」這一民族國家的概念，重新詮釋了在時空的交錯、位移中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還為我們勾勒出東亞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的新視野，可說是一部非同凡響的學術論著。《想像異域》同樣延續「從周邊看中國」的視角，通過朝鮮燕行使團的「異域之眼」來探討他們如何觀察和評價中國，以期採用這種「攬鏡自鑒」的方式達到「正衣冠」的效果(頁 24-25)。這些燕行文獻數量龐大，內容極其豐富，也涵蓋了許多官方隱而不彰的歷史。因此，為研究十七世紀中葉以後清帝國內部的社會變遷及其與東亞諸國的關係、甚至是國際局勢的變動，提供了十分寶貴而深刻的史料。

全書共計 10 章並有 3 篇附錄，其中，文獻概說和時代背景在第一章、第二章和附錄三中詳細論述。作者重申了漢文燕行文獻的價值，及其與中國史料的互補關係，這些來自異域的材料有助於更好地還原清帝國與朝鮮交流的真實面貌。

縱觀各章內容，正如作者所言，這些文章可能「前後思路不同，問題有差異，風格也參差不齊，似乎有一些不整齊」，但是大體都是「(從朝鮮)想像(或觀察)異域(大清)這一主題一以貫之的」(自序頁 3)。筆者試圖以四個面向論述全書內容，其中既有朝鮮使者通過想像來建構「中國」形象的，同時也涵蓋了燕行使作為歷史的見證者目睹清帝國，甚至是東亞世界在這一階段的變動和發展。

首先，在明清易代之後，大明王朝所象徵的正統「中國」成為朝鮮燕行使歷史記憶的一部分。在燕行使書寫的隨行筆記和報告文書中，摻雜著他們的真實見聞和對文化「中國」的想像。十七世紀中葉明清易代之後，朝鮮「慕華事大」的群體意識和文化心態經歷了巨大的打擊。因此，當朝鮮使團前往燕京朝貢時，這場旅程已經「不僅是

空間的異動，也是歷史的變遷，而且是文化經驗的變化」。¹他們借助歷史遺跡作為儲存記憶和還原歷史情境的場所，在重構歷史的過程中，摻入了對異邦「中國」的建構和想像。這一部分在第三章至第六章，以及第八章中呈現。作者試以一個隨行者的視角，跟隨燕行使者離開朝鮮前往大清朝賀，分別以義州、山海關、豐潤縣榛子店、薊州和北京這五個充滿歷史記憶的異域空間展開論述。其中，無論是朝鮮使者在義州的去國傷懷、在山海關對吳三桂(1612-1678)歷史評價的爭議，以及想像中季文蘭(約活躍於 1678 年)為大明王朝招魂的故事，還是朝鮮使者在薊州所目睹的楊安廟祭祀和紫禁城初一拜堂子的見聞中，時刻充斥著朝鮮使團貶損清帝國的想像和對滿清統治的排斥、偏見，以及他們在立場、心境和認同變遷中對於當下見聞的建構和誤讀。

其次，朝鮮使團在衣冠、禮制中反映出他們對於清帝國的認同焦慮。在第七章〈大明衣冠今何在？〉和附錄一〈朝貢、禮儀與衣冠——從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國王熱河祝壽及請改易服色說起〉中，可以看出古代東亞在傳統儒家觀念的影響下，格外注重衣冠服色的象徵性和其背後的政治等級和家族親疏等關係的區分(頁 230)。所以在中國甚至儒學文化圈改朝換代的變革中，一直把「改正朔，易服色」作為重要而嚴肅的傳統，以此來象徵「認同」與「臣服」的效果。正因如此，清代的皇帝始終很在意衣冠制度中的細節，從清初入關起，就強調天下應當「剃髮易服」，表示遵從大清正統，這恰恰是他們受到漢族中國政治觀念的影響，覺得「改正朔，易服色」(頁 245)對於政治合法性的重要。當朝鮮使者穿著前朝衣冠來到清帝國

¹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 155。

時，會發現四處「著滿洲衣」的漢族臣民。同時，新的安南國王為了迎合清帝以獲得統治的合法性，也由漢家冠服改穿了滿族服飾，這兩重事件都以衣冠服色的象徵性，體現出在新的朝貢體系下「認同」的焦慮。對滿族建立的清帝國來說，「易服色」更具有特殊的意義。這不僅是以漢族傳統來確立滿族統治合法性的儀式，而且在改著滿洲衣的微妙轉換中，模糊所謂「華」與「夷」的邊界，進行強化了王朝更替的事實，還試圖通過對儒家文化傳統的遵從來緩和國內嚴峻的政治認同問題。

再次，朝鮮使團在到達北京之後，邂逅了清帝國近世前的勝概繁華。第九章〈不意於胡京復見漢威儀——朝鮮使者對北京演戲的觀察和想像〉，通過清代帝京戲曲演出這樣一個文化史側面，展現出朝鮮燕行使眼中北京的繁華和太平氣象。北京城裡的戲曲演出是燕行使觀察中國很好的材料，當時的戲曲已經商業化，是市民階層和文人雅士們重要的消費活動。這些演出不僅角色豐富多樣，演職人員分工明確，服飾道具精美華麗，甚至舞台設計也極具精巧，整個體系的成熟和繁複引得朝鮮使團驚嘆連連(頁 189)。本書彩頁中插入的《太平城市圖》(頁 215)，則是朝鮮使者在目睹了帝都的繁華景象之後，勾勒出的心中理想城市的面貌。緊湊的構圖和豐富的場景可以看出，該圖也許並非是燕行使描繪帝都的寫實作品，而是通過見聞和想像拼湊出的想像中的城市生活圖景，其背後也反映出朝鮮士大夫階層的城市理想。大清帝都眾多極具誘惑力的文化景觀吸引了朝鮮文人願意在北京多作停留，不僅可以藉此瞭解清帝國的文化盛衰，還在燕京勝景中體驗城市繁華(頁 187)。儘管朝鮮「始終認同明代中國的文化觀念和知識譜系」，但是清帝國帶給他們的「文化震撼」已經讓燕行使們對這個強大的帝國有了全新的認識。

最後，天主教在東亞的傳播反映出近世前中、日、韓三國都無法

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選擇獨善其身，而是被迫捲入到近世西洋文明對東亞的深入影響。明清兩代，是西洋知識、思想與信仰加速進入中國的時代，中國也才又一次真正地受到了根本性的文化震撼。「明神宗萬曆十一年(1583)，耶穌會傳教士羅明堅(Michele Pompilio Ruggieri, 1543-1607)和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進入中國並在此定居，標誌著西洋知識、思想和信仰全面進入中國。」²因此，從十六世紀中葉開始，中國已經逐漸從「天下」進入到「萬國」的時代語境中。第十章〈鄰居家裡的陌生人〉和附錄二〈19世紀初葉面對西洋宗教的朝鮮、日本與中國——以「黃嗣永帛書」為中心〉的主要內容就是當傳教士及其象徵的西洋文明走進東亞時，中國和它的東鄰日本、朝鮮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應對西洋文明帶來的衝擊。東亞三國面對西洋天主教的不同策略，可以說明「亞洲」或者「東亞」的內在早已不是一個圓融的整體。這種差異甚至在十世紀之後的宋代就已經顯現，因日本、朝鮮等周邊國家在此時出現的「自國中心主義」，使得他們不再願意依附於中國。日本有意識地發展自我文化，逐漸形成所謂的日本型「華夷秩序」；朝鮮則以中國的「朱子之學」為支撐開始了探索自我中心主義的歷程。因此，這一時期之後的東亞三國在格局和意識上已經與漢唐時期明顯不同了。³

縱觀全書內容，行文風格簡明精妙，生動流暢，且具有清晰的思路和深入的問題意識，同時兼具宏闊廣博的歷史視野與細緻用心的史料考訂。鑒於本書豐富的研究成果，筆者謹就以下三點探討其

² 葛兆光，《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頁441。

³ 葛兆光，〈導論——有關「中國」的歷史形成與認同困境〉，收入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1-32。

深意，望就教於方家。

首先，回顧葛兆光所提出「從周邊看中國」的研究視角。他認為歷史研究中帶有的民族立場，不可能與之脫離去回應歷史。「從周邊看中國」正是通過凸顯中國學者的立場和情感，以中國為關注中心，從「周邊」來重新審視中國的歷史發展和文化認同。鑒於上述民族立場與歷史評述之間的糾葛，書名中「異域」的涵義就具有深刻的象徵意味。「中國」二字其實是與「四夷」相對的，在受儒家正統觀念薰陶的朝鮮文人眼中，中國就應該是中華文明的所在(頁 30)。對他們來說，十七世紀中葉之後的「中國」用「異域」代替也許更合適。正如由「朝天」到「燕行」的轉變，體現的正是李朝朝鮮對於滿清統治在種族上的偏見和對「中國」文化認同的離心。同時，作者認為通過「異域之眼」，可以更客觀地在域外文獻中發現一些曾被本國人忽略，而被異域人關心的歷史細節(頁 15)。

正如前文所述，文史研究往往建立在國族認同的基礎之上，《燕行錄》雖非歷史研究和評述，但也是帶有鮮明民族立場和情感傾向的史料。朝鮮使團們常以「想像」的場景述諸筆端，過於主觀的視角常常有失偏頗，甚至帶有一定程度的扭曲。有幸的是，作者並未迴避《燕行錄》史料中的偏見和敘述中的假象，反而提醒讀者，這種敘事態度和知識選擇的背後，恰恰反映了朝鮮燕行使「尊周攘夷」的正統儒學文化心態。概因本書的研究主軸是朝鮮使團在前往燕京朝貢途中的見聞，以對比來自燕行使團外部的觀察與清代中國士大夫的自我認知或是「中心」與「邊緣」歷史論述的區隔與錯位。因此，關於燕行使觀看心態的內在原因、使團歸國後的觀察結果和知識移動，以及燕行使團以非官方立場與中國文人的「互動」等問題，也許是本書留給學界的一個重要啟示和思考空間。

第二，作者在《何為中國》一書中強調，在全球或者東亞歷史敘

述的潮流中，以「國族論述為主題，以民族主義為價值觀」的「國別史」研究仍具有其重要性。作者謹慎地對當前主張跨越「民族國家」來探討亞洲的觀點提出了看法，認為至少很難簡單地將近世前的東亞看成是超越國家的「共同體」，再次強調了宋、元之後的中國、日本、朝鮮漸行漸遠的事實。⁴這一觀點從葛兆光在早期關注「亞洲研究」的文章〈想像的和實際的——誰認同「亞洲」？〉，通過追溯晚清至民初日本與中國的「亞洲主義」言說以及這一概念的生成脈絡，質疑了重提「亞洲」的概念，是否可以真正擺脫其原始生成語境中民族主義和近代化的立場，而形成一個東亞普遍認同的共同體。⁵作者通過強調中日之間對於「亞洲主義」言說的顯著差異，也提醒當前學界對於「亞洲研究」的討論是否過於強調東亞諸國的共同之處，而忽略了「亞洲」這一概念所形成的歷史性。雖然東亞諸國的文化連結曾經存在過，但是其共同體的基礎早已逐漸消解，更顯著的是獨立性和差異性。

可以說，《想像異域》理解東亞的視角獨到且重要，但是它卻不是東亞研究唯一的角度。以黃俊傑的研究取徑相對比，兩者的處理方法則不盡相同。首先，黃俊傑提出的亞洲研究「正是出現於各國『國別史』的互動關係之中，而不是在各國『國別史』之上的一個抽象概

⁴ 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頁 27-28。

⁵ 此文初宣讀於 2002 年臺灣大學歷史系舉辦的「東亞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學術研討會，後收入《宅茲中國》（頁 171-197）。這一觀點在葛兆光評議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的文章中再次重申，他提出「亞洲究竟應當按照誰的想像來建構和描述」，反對以一種相對主義或解構主義的方法去觀照「零碎」的歷史經驗和現象。詳參葛兆光，〈九十年代日本中國學的新觀念——讀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收入葛兆光，《域外中國學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頁 15-32。

念」。⁶他認為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強調將「國別史」的研究業績涵蓋其中，以擴大歷史研究的視野。例如提出關注東亞研究中的媒介人物，除了本書中以燕行使作為媒介人物對「他者」的觀察之外，還有傳教士、教師、譯者等，另外還可以擴展到以物質(特別是書籍)文化和思想的交流課題，這些現象和材料勾聯起的東亞文化交流網絡，確能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呈現出獨特的面貌。因此相較之下，葛兆光的研究取徑可能更偏向於中國史多過東亞史，正切合「從周邊看中國」的立場。

第三，葛兆光在接受《上海書評》訪問時曾提到，《想像異域》中所採用的很多新資料都為「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研究提供了新話題。⁷「新清史」著重清帝國的滿洲元素，且運用解構的方式從邊緣去重新定義中心，質疑了以往在「漢化」和「中國中心觀」概念框架下的清朝歷史。這類研究特別注重作為新史料的「清代檔案具有的多樣性與生命力」，⁸傾向把清王朝描繪成一個有意識的，帶有某種「殖民」性質的多民族帝國。因此，很多在清代「高高在上」的官方敘述中也許一筆帶過的內容，卻較為完整地保留在域外的漢文文獻中，如在乾隆八十大壽慶典(乾隆五十五年，西元 1790 年)時，各國朝貢使團在承德的文化競賽，大清統治者對於保留明代衣冠的曖昧態度，以及滿清貴族的堂子祭祀與漢族正統儒學觀的對立等。這些社會史或文

⁶ 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臺大歷史學報》，43(臺北，2009)，頁 198。

⁷ 葛兆光口述，盛韻採訪，〈葛兆光再談歷史上的中國內外〉，《上海書評》，2017 年 2 月 19 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20229，擷取日期：2017 年 5 月 8 日。

⁸ 歐立德(Mark C. Elliott)，〈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收入劉鳳雲、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 378。

化史的例證，表面上看是移改風俗，實際卻是內在文化力量的交戰，以及清帝國歷史評價爭論的關鍵。葛兆光雖然並非完全贊同「新清史」學者的觀點，但是他卻肯定了其「超越民族國家從全球史角度看中國」的多元文化的立場。⁹

上述觀點與作者在 2017 年新著《歷史中國的內與外》中重新討論的概念契合。如果「從周邊看中國」不免讓人對「周邊」與「中心」的表述有所質疑，那麼選擇「歷史中國的內與外」則可以更為中立地界定「中國／周邊」話題的多元性。「全球史的視野，淡化了過去固定的『中心』與『邊緣』，也在更廣闊的範圍內重新觀察過去的歷史。」¹⁰這些供我們重新觀察的材料，不僅是來自他者之間的對視，還有「周邊」國家「旁觀」的視線。同時，書中對於「內／外」概念的論述，也有意在提醒學界在利用如《燕行錄》這樣「周邊」區域的漢文文獻時，要區別政治上、文化上和認同上疆域的交雜與移動。

總而言之，本書看似輕鬆易讀，實則立意深刻。作者將目光聚焦於東亞漢文文獻的研究價值，以前瞻的視野提出了很多有待發現和補正的新問題，對於重新審視近世東亞以及中國的文化史有著指南性的重要意義。雖然本書的研究視角更傾向於中國史立場的論述，但並不影響本書成為東亞歷史研究一部不可缺少的典範著作。十七世紀中葉明清易代之後，朝鮮燕行使始終在自己悲情想像的圍城中近距離觀察中國。在李朝朝鮮看來，「中國」從文明來源的天朝上國變為「華夷變態」之地。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無論朝鮮使團是否承認，此時的清帝國正在確立自己廣闊的統治疆界和建立包含多民族的大一統國家。另一方面，從朝鮮使團對於清帝國未及臣服和

⁹ 葛兆光口述，盛韻採訪，〈葛兆光再談歷史上的中國內外〉，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20229，擷取日期：2017年5月8日。

¹⁰ 葛兆光，《歷史中國的內與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頁 120。

若即若離的態度，也彰顯出東亞三國在文化和認同的疏遠，一個看似圓融的內部實則是認同上的巨大崩潰和分裂，統一的東亞不復存在，近代東亞的圖景和迫在眉睫的挑戰逐漸浮出水面。

(本文於 2017 年 5 月 18 日收稿；2018 年 7 月 11 日通過刊登)

*本文承蒙《新史學》審查人的批評指正和寶貴建議，謹此致謝。